

# 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如何促使农民的安逸富足？\*

## ——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为例

张凡 宋佳琪 张龙耀

**内容摘要：**农村金融服务点作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外包的主要媒介，在农村金融服务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迄今，鲜有文献评估其对农户生活富裕的影响。据此，本文基于 2020-2021 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富裕程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水平，但未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虽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显著提升了农户信贷规模，尤其是正规信贷规模，但由于其偏向于生活性借贷，并且存在滞后效应，未能有效提升农户的物质富裕水平。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满足了农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升了村庄的宜居程度，提高了农户满足感与幸福感，推动了农户精神富裕。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自身金融素养高和创业户中更为明显，并且不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最后，本文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消费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初步评估，发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提升了农户医疗支出占比，而对食物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和文化支出占比均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外包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信贷获得 生活宜居

## 一、引言

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成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是银行机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标准和管理要求，在农村地区创建的提供助农取款、现金服务、金融精准扶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村金融知识宣传等金融服务的综合平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在国内的实践是代理商银行（Agent Banking）或为无分支银行（Branchless Banking），基本运营模式采取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农户”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涉农金融机构选择超市、小卖部等场所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点，直接向农户提供代理收费、小额取现、消费、转账等业务。同时，这些服务点还承担征信体系建设、金融知识宣传、残损币兑换、现金监测等代理业务（Hannig & Jansen, 2010; Zahid et al., 2021）。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满足了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需求，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此外，由于无需花费建立分支机构、雇佣员工和承担运营分支机构的各种其他费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能够显著降低金融供给成本<sup>①</sup>（Ivatury & Mas, 2008; Camacho et al., 2020）。

从全国各地的实践看，关于农村金融服务点的内涵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金融服务点是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应界定为联络各类金融机构、提供各种金融中介服务的非正式机构（Benjamin et al., 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金融服务点是

\* 张凡，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研究方向：普惠金融和农村发展，电子信箱：zhangfan19xx@163.com；宋佳琪，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研究方向：普惠金融，电子信箱：songjiaqi03@163.com；张龙耀（通讯作者），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研究方向：普惠金融和农村发展，电子信箱：zhangly@njau.edu.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sup>①</sup> 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估计，一家成熟的银行分支机构的平均成本为 25 万美元，而设在商店里的迷你网点平均成本为 5 万美元，建立 ATM 机渠道的平均成本在 1 万美元，但建设有全套的 POS 机具的代理商银行平均成本仅为 2000 美元。

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模式，应界定为在固定的场所为农民提供小额金融业务的新支农模式。本研究则认为农村金融服务点实质上是一种代理关系，是金融机构在农村区域内，依托固定的服务场所，承担特定金融服务功能的一项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制度(Sangwan & Nayak, 2019)。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商来实施原来由自身进行的业务活动。顾名思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将自己经营范围内的一些业务转移给另一家承包商处理(AFI, 2012; Ndungu & Njeru, 2014)。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作为一种中介组织，通过金融机构的联合代理，外包农村非标准化金融服务，以实现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连接(Buri et al., 2018; Kochar, 2018)。其具备两大基本功能：第一，有效降低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成本。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具备了多种金融业务功能，能够满足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需求，实现范围经济(Kumar, 2006; Ivatury & Mas, 2008)。第二，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交易的效率提升(Prior & Mora, 2019)。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既充当供给者的产品推荐人角色，又充当需求者的需求代理人，减少了信息不对称(Wajdi Dusuki, 2008)。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多元化的金融功能和高效的服务效率，加速了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进程(Beck et al., 2007)。Waihenya (2012)通过对肯尼亚43家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代理商银行凭借其操作的便利和效率，提高了金融包容性和银行的财务绩效。Mbugua (2015)对肯尼亚代理商银行的研究发现，代理商银行通过扩大地理覆盖范围，使金融服务更加贴近村民，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从而显著提高了金融包容性。Achugamonu (2017)根据基于尼日利亚6个地缘政治区的代理商银行经营者问卷发现，代理商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在促进金融包容性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kileng et al. (2018)发现，代理银行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改善了乌干达金融服务的获取和使用，惠及农村特别是交通不便地区的人群。

已有研究仅关注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在金融服务中的包容性作用(Mahmood & Sarker, 2015; Danquah et al., 2017; Kochar, 2018)，而鲜有研究关注其对于农户生活富裕的影响。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农村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按照从低到高的需求层次，生活富裕主要体现为：“保障物质生活——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服务供给——增加幸福感”。目前，以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媒介的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在中国农村地区方兴未艾，那么它是否提升了农户的生活富裕程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科学评价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发展，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富裕程度展开具体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从学理和实证两方面探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户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以往关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服务供给和银行经营绩效，研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活富裕的文献还较为缺乏。第二，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这一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利用事件分析、工具变量、断点和双重差分等方法，较好地处理和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提供了较为严谨和稳健的实证分析结果。第三，从信贷获得、村庄宜居度角度，探析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全面揭示了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作用机理和影响途径。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第三部分介绍了文献综述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作用机理；第四部分介绍模型、变量和数据；第五部分探析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第六部分研究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机制；第七部分介绍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户消费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第八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制度背景

普惠金融服务点由助农取款服务点发展、演变而来。为解决银行网点的下沉越发困难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0 年在浙江、重庆、山东、湖南和陕西等省份分别在 2-4 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开展助农取款业务试点。此后，助农取款服务点发展情况成为金融服务“三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末，《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发布，助农取款服务点纳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普惠金融指标的可得性指标。但由于部分服务点布局本身低效且不合理，以及农村人口下降和数字金融发展等客观因素，助农取款服务点办理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于 2016 年达到顶峰后，呈现下降趋势。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试点助农取款服务点逐渐向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转型，从提供单纯支付服务的工具向提供简单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同年，《农村普惠普惠金融服务点支付服务点技术规范》（JR/T 0157—2018）金融行业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本标准规定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类型之一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的标识、环境、软硬件要求、安全要求、终端用户界面、交易凭证、报文格式等事项，给出了标识牌、业务公告、业务流程的样式，提供了终端用户界面、交易凭证、报文格式的规范指南。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支率先宣布辖内助农取款服务点于 2020 年 7 月全部升级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同时，多家中心支行也跟进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转型升级工作。截至 2020 年末，中国共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含普惠金融服务点）约 89.33 万个，覆盖了 99.31% 的行政村<sup>①</sup>。

一直以来，江苏省积极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设“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服务工程的战略要求，致力于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总体来说，江苏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探索起步阶段

2008 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率先在全省实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快通工程”。该工程旨在充分发挥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和服务作用，有效解决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中的突发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并提高农村支付结算水平。截至 2012 年底，江苏省共设立了 28473 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实现了全省 13223 个行政村的全覆盖。

### （二）深入推进阶段

2013 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整合辖内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资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了“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点”。基于对江苏省农村地区人民币反假、零钞兑换、国债和征信知识宣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需求，该分行于 2013 年对部分助农取款服务点进行了服务功能的扩充或整合，形成了一批多功能综合服务点点。这些综合服务点点为农民提供了支付结算、现金、国库、征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宽了服务“三农”的金融惠民项目范围。到 2015 年，江苏省已实现了综合服务点点在无银行网点行政村的全覆盖。

### （三）提质增效阶段

2019 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在此期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展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和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点的规范化升级工作，努力打造“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品牌，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为进一步促进江苏省农村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2020 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与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江苏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提质增效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提出了到 2022 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应实现地域范围的全覆盖、业务功能的全覆盖和农村服务群体的全覆盖的目标。《意见》的发布标志着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 年）》。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提质增效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将继续推动基础金融服务向农村地区有效延伸，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到 2021 年，江苏省已建成了 1.46 万个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服务点支付业务的笔数和金额较 2012 年分别增长了 513.89%和 1030.75%，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2.34%和 30.93%<sup>①</sup>。

### 三、文献评述

####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金融机构结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积极创新“量体裁衣”式的产品和服务，涌现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产品仓单融资模式和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创新产品以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将农民持有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当作抵押物品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减少农业金融市场的风险（李韬和罗剑朝，2015；Yang et al., 2018）。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机制下，当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权证以后，可将其作为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抵押物，经银行审核通过以后可按照相应额度授信（Zheng & Zhang, 2021）。如果农民违约，银行便会取得农地经营权，通过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拍卖等方式偿还违约贷款（占治民和罗剑朝，2016）。农村土地经营权在法律与功能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抵押品的性质，可以和一般抵押品一样，较好地减缓或解决农户所面临的信贷配给问题（Yang et al., 2018；顾庆康和林乐芬，2019）。因此，土地产权抵押改善了农户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提高了农户正规融资行为的参与性（Feder & Onchan, 1987；Field & Torero, 2006；Galiani & Schargrotsky, 2010；Piza & Moura, 2016；戴琳等，2020；Aikaeli & Markussen, 2022）。作为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产品，农地抵押贷款能有效激活农户的土地资本，促进农户加大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改善其信贷可得性，从而促使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农业产出的提高和农户财富水平的提升（Besley & Ghatak, 2009）。

农产品仓单融资是指首先由借款人把农产品存放到仓储公司，之后仓储公司会向银行开具仓单作为质押，最后银行会依据仓单的相应价值向借款人提供相应的贷款（贺学会和王一鸣，2007；王一鸣，2010）。这种方式使小农户获得了正规金融机构认同的抵押担保（Miranda et al., 2019），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获得更低的利率和更灵活的还款方式，有效缓解了农户的融资困难问题。此外，正规信贷市场中农产品仓单融资的出现，不仅使正规信贷供给得以增加，也有效减少了农户对高利率小额贷款的使用。并且，除传统市场外，正规信贷市场的利率变化还可能会对网络贷款市场等新型信贷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赵子铤和张馨月，2018）。综上，农产品仓单融资一方面可以提前获得资金，满足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农户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获得更高的收益。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在互联网革命下的新产物，其概念是在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上被首次提出的，定义为一切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数字化途径，打破时空限制，弥补传统金融未能触达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空白。此外，金融科技的精准计算和便利性，提高对信贷群体信用值的把握程度，革新线下流程，降低金融服务成本（Chu, 2018）。农村居民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多渠道持续增收。一方面，数字化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农村居民将获得的信贷资金投入生产经营活动中，从而促进其收入的提升（刘魏，2021）。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构建信用评估体系，降低融资门槛，提高农村居民创业意愿，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促进非农收入提升（谢绚丽等，2018）。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带动地区产业升级，改善农村居民生计质量，实现农村居民增收（李本庆和岳宏志，2022）。

纵观前人研究，本文认为还有以下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第一，大多数文章关注的是

<sup>①</sup> <http://js.ifeng.com/c/8K8MY2oz6bl>

缓解“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金融创新或者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金融创新，鲜有文献关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创新的影响，从实证讨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更是不足。第二，尚未形成一个同时涵盖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维度的基础金融服务创新影响农户福利的分析框架，多数文章只重点关注了其中一个方面。

## （二）理论分析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实现了基础金融服务的就近提供，进一步完善了农村金融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Mbugua, 2015）。普惠金融服务点具备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配置助农POS机、人民币鉴别仪器、电脑、打印机保险柜等必要的营业设备，并建立了完整的业务制度和流程，按要求配置了相应的工作人员。为农村居民办理银行卡、助农取款、转账汇款、金融产品购买等基础金融服务，并依托服务点叠加便民缴费、银联优惠购、电商物流、就业咨询等生产生活场景，积极探索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通过金融赋能提升了村庄的宜居度。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大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点都设立在较为偏僻、交通不便利的地点，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为农户提供了小额现金存取、缴纳社保、各类涉农补助资金等基础金融服务业务。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当地农村没有金融网点的难题，填补了农村腹地金融服务空白（Gokhru & Kanchan, 2023）。

第二，降低农户获取金融服务成本，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由于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缺失，当农户具有贷款需求时，需要前往距离较远的银行网点进行申请；加上贷款手续较为复杂，使其需要多次前往。这容易耗尽农户的耐心，降低了其信贷尤其是正规信贷的申请概率（Ameh and Andrew, 2017）。一般来说，普惠金融服务点通常选择中心地带、方便群众的地带、便于管理的地带，作为服务群众的辐射点。普惠金融服务点进一步夯实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满足了农村基础金融的需求，有效降低了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减轻了农户奔波劳累之苦，基本实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Assunção, 2013）。

第三，提供多样化金融业务，实现助农服务“零距离”。普惠金融服务点除提供小额存取款、转账等基础服务之外，还加载了政府家电补贴、退伍军人补贴、退休金、涉农补贴、低保、医保、救济款等资金存取功能，着力确保国家助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在本村实现金融服务“零距离”。同时配备点钞机、验钞机等银行设备，方便农户使用，还提供征信、人民币反假、防范非法集资金融知识宣传功能，承办银行积极鼓励站点经营者开展电商业务，初步建立起以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点功能为基础，以“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平台的格局，进一步拓展了金融服务功能。

农村普惠服务点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性强，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的生产生活、身心健康等均具有积极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务，降低了农民借贷成本，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创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满足了农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满足感与幸福感（Becchett & Conzo, 2013），进而有助于推动农户精神富裕。

金融素养<sup>①</sup>和信用体系缺乏是农户信贷约束产生的主要原因（Boucher et al., 2008; Disney & Gathergood, 2013）。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来看，金融素养制约家庭的信贷可获性尤其是正规借贷的获得（廖理等, 2021; 吴卫星等, 2021）。因此，较高金融素养水平的家庭表现出更高的信贷特别是正规信贷需求，故而，其正规信贷约束较低且信贷质量较高（Sol Murta & Miguel Gama, 2022; 伍再华等, 2017）。此外，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导致农村居民信贷

<sup>①</sup> 金融素养是指个体运用自身知识储备和技能，为获取尽可能多的金融福祉而采取的一系列科学有效的金融资源管理措施的能力。

约束特别是正规信贷约束的客观存在,进而制约着农村信贷市场的有效性(周群力和丁骋骋, 2013; 张三峰等, 2013; 牛荣等, 2016)。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对于农户金融素养提升和信用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首先,普惠金融服务点提升了农户的金融素养。普惠金融服务点通过选派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客户经理为金融辅导员,以信贷产品、普及征信等为主要内容,精准为村民提供金融知识宣传、惠企惠民政策宣讲等各项服务(Calderone et al., 2018)。农村金融服务点作为中介组织,通过信息公开避免农民被动接受金融产品的问题。农村金融服务点能够开展公开透明的横向比较分析,针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根据农户不同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推介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点利用其扎根基层深的优势,通过“金融夜校”、“上门指导”等形式,采用当地方言、典型案例示范、实践操作等接地气的宣讲方式,改善了农户的认知偏差和金融素养。金融素养的提升意味着农户借款人在金融体系内有着更为良好的记录和资信,其贷款尤其是正规市场的贷款概率和规模均可以显著上升(Cole et al., 2011)。

其次,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完善了农户信用体系、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成本。在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之前,由于农村地区存在经济总量较小、交通不方便、人口相对较少且居住分散等先天劣势,银行对单个农户搜集信息的成本很高(Cnaan et al., 2012),无法有效降低银行的风险成本。普惠金融服务点增加了农户信息采集的功能,打破了传统信贷调查模式,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Lyman et al., 2006; Mohamed & Elgammal, 2023)。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农村金融服务点所收集的农户真实信息,可从成本上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壁垒问题。凭借农村金融服务点提供的农户真实信用信息,能够有效规避金融机构仅依赖业内信息采集带来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从源头上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贷损失。二是农村金融服务点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农户需求信息,有效消除了金融机构与用户需求信息之间的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点能够梳理村内整体需求,向金融机构提出相关产品开发建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点作为农村金融宣传站的优势,利用其人流量大、信息传播快的特点,有效宣传金融产品并进行农户金融素养教育(Thyagarajan & Venkatesan, 2008; Dupas et al., 2014; Calderone et al., 2018)。

信贷获得能够满足农户维持或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户收入和福利水平(Li, 2018)。Khandker & Koolwal (2016)利用孟加拉的农户面板数据估计了农村信贷扩张对农业家庭产出的影响,发现小额信贷多样化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而且促进了边缘弱势农户群体的非农收入的增长。Becchett & Conzo (2013)评估了小额信贷对贫困人群福利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在不考虑由于收入变化产生的间接影响的前提下,小额信贷对借款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通常,信贷获得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有两个渠道。第一种渠道是获得信贷能够缓解农户的资金约束。农业投入消费主要是发生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而回报却发生在农作物收获以后。因此,对于储蓄水平低的农户而言,信贷能够使其获得必需的生产资金并能降低资金密集型财产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农户更可能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并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Crawford et al., 2003; Guirkinger & Boucher, 2008; Zeller et al., 1998)。第二个渠道是获得信贷能提高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并改变其应对风险的策略,进而影响其福利效果。借贷为农户提供平滑消费曲线所需要的资金而不会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农户可能愿意接受新的而富有风险的技术(Amin et al., 2003; Conning & Udry, 2007; Morris et al., 2007; Yu et al., 2020)。

##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 (一) 模型

为了系统考察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 branchless\_banking_{jt} + \gamma Z_{ijt} + \eta_i + \nu_t + \kappa_c(\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的生活富裕水平，主要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 $branchless\_banking_{jt}$  是解释变量，表示农村金融服务外包，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予以表示； $Z_{ijt}$  表示农户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eta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nu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kappa_c(\nu_t)$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用来控制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i$  表示不同的个体； $t$  表示不同的年份； $j$  表示不同的村庄； $c$  表示不同的城市。由于同村样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或相似性，本文采用了村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clustering robust standard errors）的处理方式，以消除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sup>①</sup>。

## （二）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的生活富裕水平。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农村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其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方面。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物质富裕的直观展示，也是衡量生活富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本研究采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农村居民的物质富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存在负值，本文借鉴了 Kale 等（2009）的做法，采用 IHS（Inverse Hyperbolic Sine）变换，这样保留了包括收入水平为 0 的观察值在内的全部样本，保持观测值的完整性。生活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富裕。作为内在化的心理感知，生活满意度既是反映个体对自身生活品质、生活境况等各方面的整体概括与评价，也是衡量某一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通常被视为度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您对您家的生活满意吗？（1-10 分）”和“您感觉自己幸福吗？（1-10 分）”度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解释变量，农村金融服务外包。本研究采用普惠金融服务点表示农村金融服务外包情况，用村庄有无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予以表示（1=是，0=否）。图 1 报告了江苏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年份变动趋势图。从图 1 可以看出，2021 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数量相比 2020 年有着小幅度上升，这可能跟新冠疫情有关。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增加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建设难度，降低了其普及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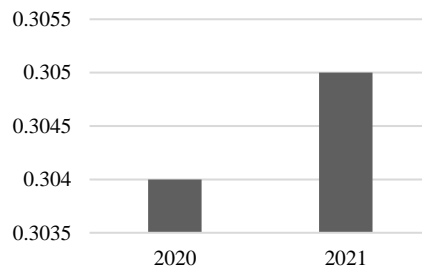


图 1 江苏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年份趋势图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选择如下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水平）、家庭特征（劳动力占比、家庭规模、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房屋面积、是否村干部户）和村庄特征（村书记受教育程度、是否贫困村和全村人均收入水平）。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sup>①</sup> 普通标准差假设扰动项式独立同分布的，但事实上由于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的综合效果，会导致其值偏小。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i>income_p</i>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经过 IHS 转换)	9.909	3.270
<i>income_w_p</i>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元 (经过 IHS 转换)	7.983	4.448
<i>income_w_o</i>	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 元 (经过 IHS 转换)	3.841	4.800
<i>satisfaction</i>	您对您家的生活满意吗?, 1-10 分	7.813	1.601
<i>happiness</i>	您感觉自己幸福吗? (1-10 分)	7.948	1.633
<i>branchless banking</i>	所在村庄是否有普惠金融服务点 (1=是; 0=否)	0.305	0.460
<i>education</i>	户主的受教育水平, 年	7.193	3.643
<i>health</i>	1=丧失劳动能力; 2=差; 3=中; 4=良; 5=优	3.941	1.106
<i>hhsiz</i>	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	5.489	50.012
<i>larbor_ratio</i>	家庭总人口, 人	57.603	47.672
<i>cadres_v</i>	耕地面积与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亩/人	4.130	1.817
<i>poor_v</i>	所在村庄是不是贫困村 (1=是; 0=否)	58.278	30.992
<i>income_v</i>	村庄的人均纯收入	0.152	0.359
<i>loan</i>	当年贷款余额, 元 (经过 IHS 处理)	1.962	4.350
<i>loan_s</i>	正规信贷金额占总贷款金额的比重, %	6.474	24.089
<i>loan_l</i>	用于生活的贷款金额, 元	8.285	27.130
<i>loan_p</i>	用于生产的贷款金额, 元	3.353	17.602

### (三)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 2020-2021 年南京农业大学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简称 CLES)。该调研由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于 2020 年创立, 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协助实施调查。CLES 数据库建设, 秉持“重走卜凯路”的理念, 抽样范围覆盖了南京农业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 (John Lossing Buck) 教授当年调研的地区。调查采用 PPS 抽样方法, 随机抽取样本县区和行政村, 部分样本县区与卜凯当年调研县区重合。调研区域由江苏为起点、逐步拓展至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2020 年, CLES 在江苏省 13 个市开展基线调研。首先, 以各区县 2010 年人口普查中乡村人口数量占所属地级市乡村人口的比例为依据, 采用不等概率抽样, 选取 2 个调研区县。其次, 以样本区县中各个乡镇街道中行政村的数量占比为依据, 采用不等概率抽样, 每个样本县抽取 2 个样本乡镇街道。接着, 每个样本乡镇以村民数量为依据, 抽取 1 个行政村, 共计 52 个行政村。最后, 在每个样本村中,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 50 户农户。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共在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抽取了 52 个行政村、2628 个农户。2021 年, CLES 项目进行了追踪调研, 平均追踪率为超过 60%。对于未追踪到的农户, 按照数量用该村其他农户补充, 保持总样本量不变。

在内容方面, 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涵盖农户生产生活、农户信贷行为、农村基础设施等研究主题。使用 CLES 数据研究普惠金融服务点具有三个明显的优势。第一, 江苏省是全国率先开设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地区之一, 并且 CLES 调研样本覆盖了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研究成果具有一般性价值。第二, CLES 是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调研, 包含了丰富的农村居民家庭信息和收入等, 具有跟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第三, CLES 调研时间刚好处于普惠金融服务点试点和推广时期, 其可以很好助力本研究捕捉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

## 五、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农民生活富裕度

### (一) 基准结果



表 2 报告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1)列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鉴于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影响<sup>①</sup>,回归结果表 2 的第(2)列和第(3)列。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的影响。表 2 的第(4)列和第(5)列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精神富裕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本文的发现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并没有提升了农民的物质富裕程度。因此,如何激发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收入的作用,是今后服务点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

**表 2**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209 (0.298)	0.303 (0.212)	0.668 (0.409)	0.392*** (0.096)	0.486*** (0.113)
户主教育水平	0.068** (0.029)	0.109** (0.045)	0.048 (0.041)	-0.010 (0.017)	0.001 (0.018)
户主健康水平	-0.037 (0.135)	0.094 (0.110)	0.145 (0.114)	0.183*** (0.053)	0.189*** (0.059)
人均耕地面积	0.000 (0.001)	0.003*** (0.001)	0.002 (0.002)	-0.000 (0.000)	0.001*** (0.000)
人居房屋面积	0.001 (0.003)	-0.005* (0.003)	0.002 (0.003)	0.002 (0.001)	0.002 (0.001)
家庭规模	0.178*** (0.063)	0.977*** (0.082)	-0.082 (0.093)	0.029 (0.022)	0.032 (0.026)
劳动力占比	0.012** (0.006)	0.045*** (0.006)	0.003 (0.005)	0.001 (0.002)	0.000 (0.002)
村干部	0.007 (0.235)	0.222 (0.288)	0.010 (0.352)	0.245* (0.141)	-0.002 (0.129)
是否贫困村	-0.145 (0.400)	-0.437 (0.515)	-1.108** (0.548)	-0.641*** (0.200)	-0.163 (0.317)
全村人均收入	-0.088*** (0.027)	-0.060 (0.049)	-0.143 (0.103)	-0.002 (0.031)	0.032 (0.022)
常数项	8.787*** (1.002)	0.974 (0.910)	4.152*** (1.400)	6.765*** (0.411)	6.524*** (0.363)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市级-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sup>①</sup>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主要的来源渠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21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04%,经营性收入占比为34.69%,两者共占比76.73%。

Cluster (村)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R <sup>2</sup>	0.767	0.846	0.799	0.768	0.764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二) 工具变量

前文的回归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然而由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可能存在内生性，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本文内生性可能来源于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首先是遗漏解释变量的问题。一些无法观测的因素或者可观测到但 CLES 数据库无法度量的因素（如，自然条件、气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不仅可以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还可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这些因素的缺失可能导致回归结果是有偏的。其次是双向因果关系。这是内生性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可以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富裕程度，反过来农户的生活富裕程度也影响公交进村。如：农村金融服务的获得可能是搬迁所致，易地搬迁或者举家迁移一般是由于收入提高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下农户生活富裕程度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可获性直接相关。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解决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根据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方案，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普遍要求其设立在有固定营业场所、信誉较好的便利店、小超市，且地理位置上最好能与最近银行距离超过 3 公里。此外，其还需要考虑村庄规模、交通条件等条件。因此，本文选择村委会到最近银行的距离与村庄常住人口的交互项作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工具变量。村委会到最近银行的距离、村庄常住人口等因素代表了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的条件，并且不受后期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004 (0.588)	0.681 (0.457)	0.605 (1.010)	1.003** (0.411)	0.844*** (0.262)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常数项	8.263*** (1.075)	0.656 (0.833)	3.310*** (1.152)	7.034*** (0.452)	6.979*** (0.386)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市级-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R <sup>2</sup>	0.2926	0.2946	0.0002	0.0362	0.0330
F值			2458.34		
P值			0.0000		
Hausman检验	0.04	2.13	0.02	3.95	1.80
P值	1.00	1.00	1.00	1.00	1.00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 3 报告了 2SLS 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发现，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均大于 10 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村委会到最近银行的距离与村庄常住人口的交互项并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此外，hausman 检验得到的统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与工具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OLS 结果是一致的。

###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然而实证结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回归结果是否受到不同模型、不同数据类型以及遗漏变量的影响。为了增加上述结构的稳健性，本文展开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断点回归。由于农户信贷获得和信贷结构等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农户信贷行为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之间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sup>①</sup>，使得直接使用 OLS 法进行估计会面临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这一点，本文利用普惠金融服务点制度设计的特点，采用断点回归（RD）来评估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断点回归识别策略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政策规则上的非连续性特征，这种政策规则使得当某个可观测的特征变量（又称驱动变量）等于或大于某个阈值时，个体就会受到处理。只要个体不能完全操纵驱动变量，那么因变量的非连续变动就可以视为由处理状态引起的。根据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方案，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普遍要求其设立在有固定营业场所、信誉较好的便利店、小超市，且地理位置上最好能与最近银行距离超过 3 公里。根据上述建设方案，本文构建以下方程：

$$D_j = \begin{cases} 1 & d_j \geq 3 \\ 0 & d_j < 3 \end{cases} \quad (2)$$

其中， $d_j$  为驱动变量，表示村委会与最近银行间的距离间隔。 $d_j \geq 3$  表示村委会与最近银行距离间隔超过 3 公里， $d_j < 3$  表示村委会与最近银行距离间隔小于 3 公里。 $D_j$  为处理变量，表示村庄是否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若村庄有普惠金融服务点  $D_j = 1$ ，否则  $D_j = 0$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假设村委会与最近银行间距离间隔超过 3 公里的村庄拥有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概率大于距离间隔 3 公里以下的村庄。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假定，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定不仅需要考虑与最近银行距离，还需要考虑村庄规模、交通条件等条件。因此，本研究采用的 RD 为模糊 RD（Fuzzy RD）。

确定普惠金融服务点组别后，可以通过估计断点回归方程（3）以识别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对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

$$Y_{it} = \alpha + \rho D_{jt} + f(d_{jt}, D_{jt}) + \gamma X_{ij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Y_{it}$  为农民生活富裕程度，主要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 $f(d_{jt}, D_{jt})$  为驱动变量  $d_{jt}$  和分组变量  $D_{jt}$  的多项式函数形式或非参数形式。在线性函数设定下， $f(d_{jt}, D_{jt})$  表现为  $d_{jt}$  和  $D_{jt}$  的一次交互项形式；在二次函数的设定下， $f(d_{jt}, D_{jt})$  表现为  $d_{jt}$  和  $D_{jt}$  的二次交互项形式。系数  $\rho$  代表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对于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这是本研究主要关注的系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由于 Imbens 和 Lemieux（2008）指出在 RD 设计中，估计系数大小与带宽的选择密切相关，故本文首先采用 Calonico 等（2014）的方法选择最优带宽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断点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Conventional	-0.355	3.060	-15.599	0.887***	0.734***

<sup>①</sup> 一般来说，普惠金融服务点通常选择中心地带、方便群众的地带、便于管理的地带，作为服务群众的辐射点，这些地区农户信贷需求和信贷获得率往往比较高。此外，农户为了提高信贷获得率和信贷规模，可能搬到设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地区。

	(0.374)	(1.921)	(11.237)	(0.146)	(0.142)
Bias-corrected	-0.230	2.291	-21.141*	0.978***	0.877***
	(0.374)	(1.921)	(11.237)	(0.146)	(0.142)
Robust	-0.230	2.291	-21.141	0.978***	0.877***
	(0.430)	(2.980)	(14.802)	(0.256)	(0.22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Bandwidth	1.001	0.737	0.613	0.690	0.742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 4 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断点估计结果。其中，行（1）报告了 Conventional 法的估计结果；行（2）报告了校正 bias 法（Bias-Corrected）的估计结果；行（3）报告了稳健法检验 robust 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回归系数的检验方式，结果都一致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但没有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

（2）联合回归。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又相互促进。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并不能进行横向比较，考虑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间的相关联系，需要进行联立估计。据此，本研究选择可同时处理多个 OLS 的 Mvreg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联合（mvreg）回归结果

	(1)	(2)	(3)	(4)
	人均收入	生活满意度	人均收入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114	0.294**	0.114	0.426***
	(0.295)	(0.140)	(0.295)	(0.143)
控制变量	Y	Y	Y	Y
常数项	7.790***	6.261***	7.790***	6.374***
	(0.554)	(0.262)	(0.554)	(0.268)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市级-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Cluster（村）	Y	Y	Y	Y
N		4789		4789
R <sup>2</sup>		0.058		0.058
chi2(1)		1.054		3.012
Pr		0.3045		0.0826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 5 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 mvreg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并没有提升农民物质富裕水平。

（3）平衡面板数据。前文结果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平衡面板数据可能产生的偏差要小于非平衡面板数据<sup>①</sup>（Verbeek & Nijman, 1992）。为此，本文保留 2020 年后数据完整的农户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① 因为平衡面板数据可以更好地控制时间和群体的影响，减少了因时间和群体变化而引起的误差。

Plan A。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与前文一致，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并没有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

(4) 双重差分模型。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全样本中包括始终拥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样本，这种情形无法体现普惠金融服务点从无到有的过程。为此，本研究删除了2020-2021年均拥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6的Plan B。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与前文一致，证实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并没有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

(5) 增加控制变量。农村集体经济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提升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控制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的Plan C。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与前文一致，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并没有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b>Plan A: 平衡面板数据</b>					
普惠金融服务点	0.209 (0.298)	0.303 (0.213)	0.668 (0.410)	0.392*** (0.097)	0.486*** (0.113)
<i>N</i>	3198	3198	3198	3198	3198
<i>R</i> <sup>2</sup>	0.632	0.771	0.702	0.654	0.648
<b>Plan B: 双重差分模型</b>					
普惠金融服务点	0.225 (0.261)	0.272 (0.226)	0.679 (0.434)	0.384*** (0.102)	0.474*** (0.115)
<i>N</i>	4044	4044	4044	4044	4044
<i>R</i> <sup>2</sup>	0.791	0.849	0.810	0.789	0.785
<b>Plan C: 增加控制变量</b>					
普惠金融服务点	0.167 (0.308)	0.309 (0.208)	0.628 (0.434)	0.400*** (0.091)	0.512*** (0.096)
集体经济	0.267 (0.172)	-0.080 (0.096)	0.282* (0.171)	-0.047 (0.121)	-0.146 (0.102)
<i>N</i>	4607	4607	4607	4607	4607
<i>R</i> <sup>2</sup>	0.769	0.846	0.803	0.776	0.772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交互项、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

## 六、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影响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作用渠道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可能通过信贷获得，减少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影响农民的生活富裕水平；此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通过便民服务的供给，提升村庄的生活宜居度，进而提升农民的精神富裕程度。为此，我们将信贷规模和村庄宜居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 (一)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有助于提升村庄的宜居度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通过提升村庄的宜居度，进而影响农民的生活富裕程度。据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村庄宜居度的影响。表7的第(1)列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村庄宜居程度<sup>①</sup>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① 村庄宜居度用“您对本村生态宜居（村容村貌、生活便利、污水与垃圾治理、空气质量等）的满意度”予以表

点的建设显著提升了农民对于村庄生态宜居的满意度,证实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有助于提升村庄的宜居度。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助农取款、社保卡激活、农医保缴费、生活缴费、免费转账等“一篮子”金融服务,还有‘社保+’‘物流+’‘代购+’等民生服务,为村民提供生活、办事便利。

## (二)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有助于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设定能够提升农户的金融素养并且通过特定的授信方式降低了农户贷款逾期还款的概率,缓解了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了农户的贷款规模。首先,检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能否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表7的第(2)列和第(3)列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信贷获得影响。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显著提升了农户信贷规模,并且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出现会促进农户资金需求从非正规信贷市场转向正规信贷市场。理论上,信贷获得可以帮助农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缓解农户的财务压力,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现实中,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户的信贷获取概率,但未能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农户借贷需求的结构。从借款用途看,合法借贷一般用于生活需求或生产经营急需。据此,本文将农户借贷需求的结构划分为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其中,生活性借贷是指借入方借入资金后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借贷行为,本文用生活性消费借贷占贷款规模的比重予以表示;所谓生产性借贷是指借入方借入资金后用于生产或商业经营活动的借贷行为<sup>①</sup>,本文用生产性消费借贷占贷款规模的比重予以表示。表7的第(4)列和第(5)列汇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户借贷需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活性消费借贷比例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促使农户增加了生活性消费借贷的比例。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生产性消费借贷比例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并没有使得农户增加生产性消费借贷比例。综上所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主要增加了农户生活性借贷。由此可见,生活借贷成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贷款主体,这是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未能提升农户物质富裕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二,滞后效应。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民物质富裕程度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信贷获得对农户物质富裕水平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这种滞后效应可能是资金流向的延迟、经济活动的适应期或者市场反应的滞后等导致的。为了验证滞后效应的存在,本文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滞后一期,回归结果见表7的第(6)列-第(8)列。结果显示,滞后期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显著提升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而对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缓解了村庄产业发展的信贷约束,带动了农户的就业。

表7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户信贷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本村生态宜居	贷款金额	贷款结构	生活性贷款	生产性贷款	人均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普惠金融服务点	0.103** (0.042)	0.870** (0.363)	7.288*** (2.241)	6.345*** (1.754)	2.756 (1.962)			
普惠金融服务点(滞后期)						-0.180 (0.196)	0.586*** (0.215)	-2.011 (3.18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常数项	3.660*** (0.186)	1.712** (0.732)	1.832 (4.762)	11.472** (5.259)	11.944*** (4.319)	8.190*** (0.730)	-0.392 (0.799)	2.248 (17.048)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示

<sup>①</sup> 生活上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建造新房等,生产上主要是用于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购买农机具、农产品加工等。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1632	1632	1632
R <sup>2</sup>	0.739	0.789	0.782	0.755	0.721	0.021	0.293	0.223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三)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金融素养与农民生活富裕

金融素养是影响有效需求的重要变量，金融素养缺乏会导致农户的认知偏差与非理性决策，抑制有效金融需求。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影响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贷款机制与金融素养息息相关。金融素养，主要指的是农户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业务的认知。本文采用“您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传统信贷业务了解吗?(0=不了解; 1=了解; 2=了解并感兴趣; 3=了解、感兴趣并申请; 4=了解、感兴趣、申请并且获得授信)”予以度量，并且引入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 的第(1)列-(5)列。回归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金融素养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户，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其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就越大。金融素养作为有效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其差异性会导致农户不同的信贷行为。金融素养较高的经营主体认为其能够准确判断资产收益率，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借贷策略，以便获得经营性收入，而金融素养较低的经营主体倾向于低风险偏好，采取稳健或消极的借贷策略。

**表 8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的影响渠道分析**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165 (1.179)	0.151 (1.008)	-1.115 (0.877)	0.849** (0.347)	0.870** (0.422)
普惠金融服务点*金融素养	0.087 (0.245)	0.033 (0.236)	0.410* (0.207)	-0.106 (0.079)	-0.089 (0.095)
金融素养	-0.017 (0.120)	-0.149 (0.115)	-0.360** (0.129)	0.056 (0.054)	0.035 (0.058)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常数项	8.856*** (1.220)	1.705 (1.115)	5.853*** (1.616)	6.509*** (0.493)	6.369*** (0.452)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R <sup>2</sup>	0.765	0.846	0.799	0.769	0.764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四)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创业与农民生活富裕

资金需求量是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生活富裕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按照农户资金需求量的差异，分为是否创业户，引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是否创业户的交互项，检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9。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是否创业户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创业户更有可能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发展中获得经营性收入的提升。这是因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降低

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增加了创业户获得信贷的概率，提升了经营性收入。

**表 9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创业与农业生活富裕程度**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316 (0.300)	0.193 (0.374)	0.074 (0.304)	0.357*** (0.094)	0.453*** (0.113)
普惠金融服务点*是否创业户	-0.456 (0.375)	0.172 (0.245)	0.782*** (0.296)	0.177 (0.112)	0.186 (0.123)
是否创业户	-0.674 (0.861)	-0.573 (0.450)	0.917 (0.571)	0.223 (0.237)	0.203 (0.23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常数项	8.686*** (0.987)	0.325 (0.607)	4.560*** (0.696)	6.801*** (0.407)	6.560*** (0.365)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R2	0.767	0.353	0.830	0.769	0.765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市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五)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精英俘获效应

在农村借贷市场中，存在着“精英俘获”现象。部分“精英农户”利用自身优势追逐利益，以便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设立对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精英俘获”效应值得我们关注。精英俘获 (elite capture) 是权力结构不均衡导致的资源垄断现象，通常是指本应为多数人享用的资源却被一些少数人占有，这些少数人通常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政治关系或信息 (Diya Dutta, 2009)。村干部在信息获取和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在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精英俘获有可能大量产生。据此，本文引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是否村干部的交互项，验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精英俘获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10。结果显示，所有方程中，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与是否村干部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经营俘获效应。

**表 10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精英俘获效应检验**

	(1)	(2)	(3)	(4)	(5)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生活满意度	生活幸福感
普惠金融服务点	0.277 (0.317)	0.179 (0.357)	0.695 (0.462)	0.400*** (0.097)	0.513*** (0.118)
普惠金融服务点*是否村干部	-0.398 (0.543)	-0.387 (0.265)	-0.155 (0.650)	-0.047 (0.278)	-0.153 (0.236)
是否村干部	0.144 (0.242)	0.869*** (0.192)	0.064 (0.450)	0.261 (0.165)	0.051 (0.15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常数项	8.776***	0.344	4.147***	6.763***	6.520***



	(1.001)	(0.596)	(1.399)	(0.412)	(0.362)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4789
R2	0.766	0.353	0.799	0.768	0.764

注：括号内是聚类村层面稳健的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 七、进一步分析

### (一)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促使农户增加了生活性消费借贷的比例，而生产性借贷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据此，本研究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11。回归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显著提升了农户医疗支出占比，而对食物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和文化支出占比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户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获取的生活性借贷基本上用于医疗支出，以此来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

**表 11**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

	(1)	(2)	(3)	(4)
	食物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占比	医疗支出占比	文化支出占比
普惠金融服务点	0.012 (0.036)	0.001 (0.010)	0.023* (0.014)	-0.004 (0.004)
控制变量	Y	Y	Y	Y
常数项	0.436*** (0.040)	0.041 (0.034)	0.262*** (0.032)	0.024** (0.010)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R2	0.737	0.803	0.800	0.662

注：括号内是聚类村层面稳健的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 (二)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增收环境和动力机制的调整变化致使农村家庭增收形势趋于复杂化，对农户增收形成制约。因此，避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据此，本文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13。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表 13**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1)	(2)	(3)	(4)
	基尼系数	90/10分位数收入比	80/20分位数收入比	70/30分位数收入比
普惠金融服务点	-0.030 (0.040)	-0.380 (0.682)	-0.382 (0.369)	-0.184 (0.226)
控制变量	Y	Y	Y	Y

常数项	0.203*** (0.048)	4.406*** (0.784)	3.478*** (0.480)	2.178*** (0.303)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县域-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Cluster (村)	Y	Y	Y	Y
N	4789	4789	4789	4789
R2	0.040	0.044	0.088	0.085

注：括号内是聚类层面稳健的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进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服务外包,有效延伸金融服务半径成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从服务功能来看,农村金融服务点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机构联合代理代办农村非标准化金融服务的外包制度,是连结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据此,本文基于中国土地经济 2020-2021 年数据,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为例,结合事件分析法、工具变量法、断点等模型,在微观层面探究了农村金融服务外包对农户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富裕,但没有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虽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显著提升了农户信贷规模,尤其是正规信贷规模,但由于其偏向于生活性借贷,并且存在滞后效应,未能有效提升农户的物质富裕水平。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满足了农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升了村庄的宜居程度,提高了农户满足感与幸福感,推动了农户精神富裕。此外,考虑到农户信贷行为受自身金融素养和资金需求量的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自身金融素养高和创业户中更为明显。村干部在信息获取和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在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精英俘获有可能大量产生,但本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经营俘获效应。最后,本文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消费效应进行初步评估,发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提升了农户医疗支出占比,而对食物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和文化支出占比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户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获取的生活性借贷基本上用于医疗支出,以此来提升家庭的健康水平。同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对农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立足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继续依托银行金融机构打造普惠金融服务点,增强乡村金融资源承载力,切实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农户融资贵和融资难等问题。

第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应当加强对于农户尤其是生产性借贷的支持力度。普惠金融服务点应当通过排列组合授信方式、授信额度、时间期限、还贷方式等元素,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努力做到应贷尽贷,既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现状,又解决了融资难问题。

第三,借助金融服务点作为农村普惠金融“前哨”的作用,积极开展“金融夜校进乡村”活动。通过金融夜校的方式,向村民传播整村授信、金融反诈骗相关知识、宣传老百姓需要的金融业务、加深专项金融知识讲解,有效解决农村群众获取金融知识渠道有限、防范金融诈骗意识薄弱的问题,发挥金融夜校的实效,提升村民的金融素养,使每一位村民都能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

第四,政府应当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网点和功能选择。各地区根据辖内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实际,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按照“平等自愿、风险可控”的原则,主要以现有助农取款服务点位依托,选择场所条件较好、信用状况优良、人员素质较高、业务需求较大的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 参考文献

- 戴琳,于丽红,兰庆高等.农地抵押贷款缓解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了吗——基于辽宁省 434 户种粮大户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03):20-31.
- 顾庆康,林乐芬.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缓解异质性农户信贷配给难题吗?[J].经济评论,2019(05):63-76.DOI:10.19361/j.er.2019.05.05.
- 贺学会,王一鸣.发展仓单系统: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新思路[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2):2-7.
- 李本庆,岳宏志.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06):95-107.DOI:10.13676/j.cnki.cn36-1224/f.2022.06.004.
- 李韬,罗剑朝.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基于 Poisson Hurdle 模型的微观经验考察[J].管理世界,2015(07):54-70.DOI:10.19744/j.cnki.11-1235/f.2015.07.007.
- 廖理,初众,张伟强.中国居民金融素养与活动的定量测度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7):43-64.DOI:10.13653/j.cnki.jqte.2021.07.003.
- 刘魏.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6):65-77.
- 牛荣,张珩,罗剑朝.产权抵押贷款下的农户信贷约束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01):76-83+111-112.DOI:10.13246/j.cnki.iae.2016.01.010.
- 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中国金融,2010(04):32-34.
- 吴卫星,张旭阳,吴锟.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J].金融研究,2021(08):119-137.
- 伍再华,谢北辰,郭新华.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7,37(12):20-35.DOI:10.19559/j.cnki.12-1387.2017.12.002.
-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04):1557-1580.DOI:10.13821/j.cnki.ceq.2018.03.12.
- 张三峰,王非,贾愚.信用评级对农户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影响——基于 10 省(区)农户信贷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07):72-84.
- 赵子敏,张馨月.P2P 网贷市场与正规金融市场——基于溢出效应的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34(04):108-118.DOI:10.13962/j.cnki.37-1486/f.2018.04.009.
- 周群力,丁骋骋.姓氏与信用:农户信用评级中的宗族网络[J].世界经济,2013,36(08):125-144.DOI:10.19985/j.cnki.cassjwe.2013.08.007.
- Achugamonu B U, Taiwo J N, Ikpefan O A, et al. Agent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Nigerian experience[C]//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onference-vision. 2020: 4418-4430.
- Aikaeli J, Markussen T. Titling and the value of land in Tanzani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22, 34(3): 512-531.
- Akileng G, Lawino G M, Nzibonera E. Evaluation of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Uganda[J]. 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 and Banking, 2018, 8(4): 47-66.
- 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Agent Banking in Latin America[J].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fif-global.org/sites/default/files/discussion\\_paper\\_-\\_agent\\_banking\\_latam.pdf](https://www.afif-global.org/sites/default/files/discussion_paper_-_agent_banking_latam.pdf)
- Aneh M, Andrew I C.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agricultural loan acquisition among small-scale rice farmers in benue state, Niger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Agriculture & Biology Research, 2017, 5(4): 8-17.
- Amin S, Rai A S, Topa G. Does microcredit reach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Evidence from northern Banglades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0(1): 59-82.
- Assunção J. Eliminating entry barriers for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services: Evidence from 'banking correspondents' in Brazil[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37(8): 2806-2811.
- Becchetti L, Conzo P. Credit acc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aluating th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micro finance[J]. Applied Economics, 2013, 45(9): 1201-1217.
- Beck T, Demirgüç-Kunt A, Levine R. Finance, inequality and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27-49.
- Benjamin L, Rubin J S, Zielenbach S.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4, 26(2): 177-195.
- Besley T, Ghatak M. Reforming property rights[J].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2009.
- Boucher S R, Carter M R, Guirking C. Risk rationing and wealth effects in credit markets: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 90(2): 409-423.
- Buri S, Cull R, Giné X, et al. Banking with agen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enegal[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8 (8417).
- Calderone M, Fiala N, Mulaj F, et al.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among low-income clients of branchless banking in Ind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8, 66(4): 793-825.
- Calonico S, Cattaneo M D, Titiunik R. Robust nonparametr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s[J]. Econometrica, 2014, 82(6): 2295-2326.
- Camacho J A, Molina J, Rodríguez M.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in branchless municipalities: An analysis for Andalusi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1, 29(5): 883-898.
- Chu A B. Mobil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inclusion[M]//Handbook of Blockchain, Digital Finance, and Inclusion, Volume 1. Academic Press, 2018: 131-144.
- Cnaan R A, Moodithaya M S, Handy F. Financial inclusion: lessons from rural South India[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2, 41(1): 183-205.
- Cole S, Sampson T, Zia B. Prices or knowledge? What drives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6): 1933-1967.
- Conning J, Udry C.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3: 2857-2908.
- Crawford E, Kelly V, Jayne T S, et al. Input use and market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 overview[J]. Food policy, 2003, 28(4): 277-292.
- Cull R, Gine X, Harten S, et al. Agent banking in a highly under-developed financial sector: Evidence from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7: 54-74.
- Diagne A, Zeller M, Sharma M P. EMPIRICAL MEASUREMENTS OF HOUSEHOLDS'ACCESS TO CREDIT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VIDENCE[R]. 2000.
- Danquah M, Quartey P, Iddrisu A M.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via rural and community bank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households in Ghana[J]. Journal of African Development, 2017, 19(2): 67-76.
- Disney R, Gathergood J. Financial literacy and consumer credit portfolio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37(7): 2246-2254.
- Dupas P, Green S, Keats A, et al. Challenges in banking the rural poor: Evidence from Kenya's western province[M]//African Successes, Volume III: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63-101.
- Dutta D. Elite capture and corruption: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J].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2009, 4: 1-16.
- Feder G, Onchan T. Land ownership security and farm investment in Thailand[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7, 69(2): 311-320.
- Field E, Torero M. Do property titles increase credit access among the urban poor? 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titling program[R].

-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2006.
- Galiani S, Scharrogradsky E.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oor: Effects of land titl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 94(9-10): 700-729.
- Gokhru N, Kanchan P. A STUDY ON IMPACT OF SHGs ON WOMEN'S FINAN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Public Policy and Research*, 2023, 2(SpecialIssue): 1-6.
- Guirking C, Boucher S R. 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 in Peruvian agriculture[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 39(3): 295-308.
- Hannig A, Jansen 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Current policy issues[J]. 2010.
- Imbens G W, Lemieux T.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A guide to practi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8, 142(2): 615-635.
- Ivatury G, Mas I. The early experience with branchless banking[J]. *CGAP Focus Note*, 2008 (46).
- Kale J R, Reis E, Venkateswaran A. Rank-order tournaments and incentive alignment: Th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3): 1479-1512.
- Khandker S R, Koolwal G B. How has microcredit supported agriculture?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47(2): 157-168.
- Kochar A. Branchless banking: Evaluating the doorstep delivery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rural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5: 160-175.
- Kumar A. Expanding bank outreach through retail partnerships: correspondent banking in Brazil[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6.
- Li 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poverty: The role of relative income[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52: 165-191.
- Lyman T, Ivatury G, Staschen S. Use of agents in branchless banking for the poor: rewards, risks, and regulation[J]. *Focus note*, 2006, 38(1): 1.
- Mahmood R, Sarker S.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branchless banking: A review of agent banking and its impact[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6(23): 86-93.
- Mbugua S. Role of agent banking services in promo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Nyeri Town Kenya[J].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5, 6(3): 2222-2847.
- Miranda M J, Mulangu F M, Kemeze F H. Warehouse receipt financing for smallhold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9, 50(5): 629-641.
- Moahid M, Khan G D, Yoshida Y, et al. Agricultural credit and extension services: Does their synergy augment farmers' economic outcome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7): 3758..
- Mohamed T S, Elgammal M M. Does the extent of branchless banking adoption enhance th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J]. *Applied Economics*, 2023: 1-18.
- Morris M, Kelly V A, Kopicki R, et al. Promoting increased fertilizer use in Africa: Lessons learned and good practice guidelines[J].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7.
- Ndungu C G, Njeru A. Assessmen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doption of agency banking in Kenya: The case of Kajiado north sub coun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2014, 3(8): 91-111.
- Prior F, Mora T.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Branchless Banking o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19, 90(4): 641-668.
- Piza C, de Moura M J S B. The effect of a land titling programme on households' access to credi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2016, 8(1): 129-155.
- Sangwan S, Nayak N C. Do outreach approaches differ between self-help group-bank linkage an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based microfinance? Evidences from Indian states[J]. *Journ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9, 21(1): 93-115.
- Sol Murta F, Miguel Gama P. Does financial literacy "grease the wheels" of the loans market? A note[J].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2, 39(2): 331-341.
- Thyagarajan S, Venkatesan J. Cost-Benefit and Usage Behaviour Analysis of No Frills Accounts: A Study Report on Cuddalore District[J]. *IFMR/CMF Working Paper, IFMR/CMF, Chennai*, 2008.
- Verbeek M, Nijman T. Testing for selectivity bias in panel data model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2: 681-703.
- Waihenya H M. The effect of agent banking on financial inclusion in Kenya[D]. *University of Nairobi*, 2012.
- Wajdi Dusuki A. Banking for the poor: the role of Islamic banking in microfinance initiatives[J]. *Humanomics*, 2008, 24(1): 49-66.
- Yang X, Luo J, Yan W.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mortgage loan program on income: evidence from the western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8, 10(4): 695-711.
- Yu L, Zhao D, Xue Z, et 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adoption of green control techniques by family farms in China[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0, 62: 101323.
- Zahid M, Rahman H U, Ullah Z, et al. Sustainability and branchless banking: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distinct measurement scale[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1, 67: 101764.
- Zeller M, Diagne A, Mataya C. Market access by smallholder farmers in Malawi: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adop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crop income[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19(1-2): 219-229.
- Zheng H, Zhang Z. 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mortgage default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in recent China based on 724 court decisions[J]. *Land*, 2021, 10(7): 729.

# **Can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enrich residents' lives?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inclusion service points in rural China**

ZHANG Fan<sup>a</sup>, SONG Jiaqi<sup>b</sup> and ZHANG Longyao<sup>c</sup>

(a: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ummary:** Financial inclusion service points, as primary intermediaries for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market.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evaluating its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households. To study how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points affect their affluence, we examined the 2020-2021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data by the econometric model and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ervice points ha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households' spirit, but did not remarkably increase material abundance. Although the inclus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points in rural areas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redit scale for farming household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formal credit, their inclination towards consumption-based borrowing and the presence of lagging effects have not effectively elevated the material wealth levels of these households. Because of these service points, the financial needs of farming households have been diversifying, which also benefited the livability of villages, the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nd finally contributed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households.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the effect is much more obvious among families with high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elite capture".

**Keywords:**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points; Credit availability; Livability